文苑笔谈

家训校训中的中国往事

张安娜

《尚书·酒诰》记载,西周开国元勋周公从灭殷的胜利中,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理念,首开帝王家训先河,这也是最早有记录的家训之一。三千年来,历代名人志士、文豪学者、文武大臣多以家训的形式训诫子弟、垂饬后代。

训的目的是教育后人。“训,说教也。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引申之凡顺皆曰训。”《说文解字注》对“训”这样注释。训是随着家庭产生而出现的教育形式,有了家,才有家道,才有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教育问题。家庭、学校赋予的能量,是未成年人成长的引擎。漫步历史长河中,在刚性律法之外,以严管厚爱为目的的家训校训不仅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更传承着中华民族的风骨。

《易·家人》中说:“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则家道正。”意思是父子兄弟夫妇各守其位,各尽其责,是治家之正道。《礼记·大学》篇中认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古人不但强调家族社会地位的稳固,也重视良好家风的维护,就是基于这种社会责任。

家风既然如此重要,家训作为古代主要训俗,自然应运而生,并且随着时代演进不断发展。据《中国丛书综录》记载,从南北朝到清代共有家训著作117种,包括家诫、家规、家书、家范、家箴、庭诰、遗训、诗联等多种形式。

从汉代到明清,以《孔子家语》《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为代表的家训作品一直都在流传,为子孙留下文本形式的训诫成为一种趋势。比如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教育继承人如何做好皇帝而编写了《帝范》。八旬老翁陆游在去世前一年冬天写下了最后一首教子诗——妇孺皆知的《示儿》,不仅激励子孙为国尽忠,更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为国家尊严浴血奋战。

司马光教子弟,未及冠笄,鸡打鸣就要起床,帮助长辈供养祭祀。孩子长到六岁,学数字与地名,七岁读《孝经》《论语》,八岁诵《尚书》,九岁读《春秋》。唐武宗时浙西观察使李景让,性格过于严厉,手下的许多将士都产生了反叛的念头。李景让的母亲得知儿子的行径后,亲自升堂并鞭挞李景让,“小有过,不免捶楚”,直到其麾下将士齐齐为头发斑白的李景让求情才住手……正是这一个个看似严苛的家庭生活片段,成就了那些永不消散于史册的桂馥兰馨。

家训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从内容看,其核心是修身、治家、立业,本质是伦理教育和人格塑造。在对家训的坚守中保持家风,不随时而变,治家者自觉地维护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同样被维护的价值观,还有校训。

校训是学校办学理念的核心,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我国古代虽没有独立的“校训”词组,但却存在校训的精神内核。《大学》中的“三纲领八条目”,《学记》中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南宋白鹿洞书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虽说并非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所指的校训,但内容和形式却为校训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是当今校训效法的样板和取材的“总库”。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官学下移”的局面,各学派纷纷兴起,倡导私学,个性化的办学理念有了萌发的土壤。孔子兴办私学,提出了“仁”的学说,并且倡导“智”“仁”“勇”。墨家的“兼爱”、道家的“自然无为”和法家的“权势”等思想,都为后世校训的出现在内容上作了铺垫。《大学》在总结前人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把教育目的概括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成为后来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指导方针。尤其是《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为以后校训的出现在内容上奠定了基础。

我国古代校训的最早源头应该追溯到南宋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忠孝廉节”的院训。

乾道三年,朱熹到岳麓书院拜访张栻,亲书“忠孝廉节”四字悬于讲堂,并在书院切磋讲学月余,“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联床”。当时,岳麓书院的“忠孝廉节”悬挂于门楣上,并以碑刻的形式公诸于讲堂,镶嵌于壁。后来,无锡东林书院院训“依德之行、庸人之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贵州永宁书院院训“格物、诚正、修养,知所先则近道;孝悌、谨信、亲爱,行有余以学文”等也都成为院训中的上品。

书院的人文魅力与生源息息相关,办学者自然要在文化品调上大做文章。这种意义还有更生动悲悯的解读。朱熹的学说被诬为“伪学”,后来他竟被判为“逆党”,他和学生遭受迫害。在官府即将拘捕他的得意门生蔡元定的前夕,他邀约蔡元定晚上同住。这天晚上,师生俩在一起竟通宵校订了《参同契》一书,直到东方发白。蔡元定被官府拘捕后杖枷三千里流放,死于道州,他在对师恩的感念中留下遗训:“步步守着仁、义、礼、知、信,可传子孙。”世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牵挂,但像蔡元定这样的人,哪怕身无一物,却唯有品节之美,不能断念。

追随岁月流光对中华遗风进行梳理,我们清晰地看到,“训”是为了教育,是为了让人类的精神和文明代代递交。教育从来都是一种世代性的积累,提升民族素质是一种历时久远的磨砺,但这种积累和磨砺能不能一直往前走呢?不能否认,历史的局限会容留部分糟粕,但瑕不掩瑜,传统德行依然会激发现代人的强烈共鸣。祖先曾不辞辛劳、不畏艰难,为我们殚精竭虑,思虑周全,用强烈的生命体验写就一部部凝聚爱意的经典训作,当下的我们,又怎能视而不见?

那些不形于色的爱,正是通过这样的一句句朴实的话语流传于世——“传家两字,曰耕与读;兴家两字,曰俭与勤;安家两字,曰让与忍;防家两字,曰盗与奸;败家两字,曰嫖与赌;亡家两字,曰暴与凶……”

思过去才能行未来。王安石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讲的是规则之治对国家的重要性。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立善训于家于校,则未来期”。只有真正读懂家训校训的中国往事,才可能书写出未来的美好故事。

阅评

生态寓言

刘晓莹

在所有的文体中,寓言是最为神奇的一种。寓者,寄也。所谓寓言,是以假托的故事或拟人的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寓意,让小故事蕴含大道理,把大道理形象化、艺术化,从接受美学上讲,更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庄子·寓言》中讲,“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意思是寄寓的言论十句有九句让人相信,引用前辈圣哲的言论十句有七句让人相信,这就是寓言这种文体的神奇之处。

虽然寓言都是用假托的故事在讲道理,但这种假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某一个体的经验展现具有普遍性的道理,比如,出自《列子·说符》的“疑邻盗斧”:“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斧也;颜色,窃斧也;言语,窃斧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行动、颜色、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也。”这种遇事胡乱猜疑的做法在生活中很常见。

另一种是用一个虚拟的故事推演出可能的结果,比如,出自唐代《枕中记》中的“黄粱一梦”:卢生在邯郸客店遇道士吕翁,自叹穷困。吕翁取青瓷枕让卢生睡觉,这时店主正在煮小米饭。卢生在梦中享尽荣华富贵直到80岁,但一觉醒来,店家的小米饭还没熟。借助一个虚拟的人物,推演其中一种选择下的人生故事,最终讲述的是幸福生活不是可以靠虚幻的美梦得来的。

1.

寓言创作的领域还有生态环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人类同样意识到作出选择的重要性和结果的不可逆性,生态文学应运而生,生态寓言因此成为作家们为了让更多的人真切地感受到生态危机,自觉或不自觉运用的一种文学形式。我们可以把《山海经》中的一些故事当作生态寓言来读。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共工触天、鲧禹治水……这些神话以故事的形态记录了史前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争斗。

在中国文学史上,生态寓言第一人非庄子莫属。早在两千多年前,庄子便已经先知先觉地讲述了众多优美而富有创见的生态寓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中的这一名句集中体现了庄子的生态观。《逍遥游》中樗树的故事可以作为庄子生态观的一个注脚来读。古之樗树,即现在所称的臭椿树,是我国北方常见的乡土树种。一次,惠子告诉庄子:“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在惠子眼中,樗树是大而无用的一种树。然而,在庄子看来,像这样的树,不会遭刀斧砍伐,人可以“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这就是它的用处。在庄子的寓言里,无论动物、植物,都是具有人格,是能和人类对话的,与人类同属自然并共同阐释天理的平等的物种。“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在《庄子·盗跖》中,他如此描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并推崇这样的道德。庄子关于自然价值及其与人类生态关系的主张是超前而智慧的。

近代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包括生态寓言在内的生态文学成为众多作家自觉耕种的园地。

美国科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是西方现代生态文学的代表。书中《威斯康星州》一篇里讲述了一个“沼泽挽歌”的生态故事。一个远古大湖残留形成的沼泽,生长着落叶松、云杉、莎草、羽叶蕨,鹤群每年春天都会来到这里繁育后代。不太久远的某个大旱之年,有人在落叶松林里放了一把火,清除掉死树后,这里变成了一片旱涝保收的草场。于是,人们开始定期带着火与斧来到这里,辽阔的沼泽上便星星点点地布满了草场。人类逐利的天性让新来的领主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开始挖沟开渠、排水造田,试图扩大收益。然而,这些投入巨大的辛苦劳作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收益,反而使泥炭层干涸、收缩、起火,田地和牧场被烧得满目疮痍。无奈之下,人们不得不堵塞排水沟渠,退地还水,让沼泽地重新恢复……

这是一个关于人类对大自然改造失败的真实故事。正如作者所说:“所以故事总是在自相矛盾中结束,无论是沼泽的故事还是市场的故事。”但这并不新奇,这样的故事在人类的历史中并不少见,只有当我们具有生态保护意识时,我们才可能把它当作生态寓言来读——在这个真实的生态故事中,同样寄寓着人类在惨痛教训中获得的可贵的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2.

一位老人孤身在海上捕鱼,84天一无所获,等终于钓到大鱼,用了两天两夜才将其刺死。返航途中突遭鲨鱼袭击,经过一天一夜的缠斗,大鱼仅存骨架。但老人并未失去希望和信心,休整之后,准备再次出海……我们可以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读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可以被毁灭,但是不能被打败。”正是这种人生态度赋予了小说主人公勇敢、自信、永不言弃的性格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注。人对自然的征服欲望越来越大,自然对我们的报复也越来越强,人与自然不和谐的一面也就随之显露出来。与那些仅仅把海洋当作一种可以获得很多经济利益的主体不同,老人以爱、尊重和敬畏的眼光看待海洋。

李娟的散文《木耳》也可以当作生态寓言来读。在阿勒泰深山的森林里,“有一天木耳来了”。木耳的出现,就像蝴蝶的翅膀,引发了连锁的反应:起初是少数人去深山采野木耳,随着野木耳售价的不断攀升,人们源源不断地涌来,纷纷扛着行李投入山野,越来越多的人以采木耳为主业,同时又开始挖党参,挖虫草,挖石榴石,“由于破坏草场植被而引起的纠纷接二连三地发生着”,“河边的树林里堆满了以塑料制品为主的垃圾”,还有人打野味、用雷管炸鱼,人们分成几派,彼此仇恨。这个时候,木耳的用处已不是用来吃的,而是“作为礼品和一种时髦的消遣物”。进入木耳出现后的第三年,当地爆发了牲畜大规模的新类型瘟疫,但瘟疫也没能阻止采木耳的行为。直到“木耳出现后的第五年或第六年——再也没有木耳了”,只留下河边的垃圾仍然在堆积和蔓延……

李娟以细腻的笔触,写了一个完整的寓言。大自然给了人类“木耳”这样一种馈赠,这种远离世事,生长在森林隐秘角落需要人类费劲寻找的无辜植物,给附近的人们带来致富希望、竞争意识以及龃龉、龌龊,刺激人的欲望膨胀,引起人际关系崩坏,导致对大自然的粗暴破坏,然后木耳仿佛从来未出现过一样,凭空消失。作者并无任何劝谕,她只是提醒人们:“但总会有什么更为强大更为坚决的意志吧,凌驾在人的欲望之上……”凌驾在人的欲望之上的是什么呢?应该是自然法则。如果人与自然不能和谐相处,则必然会触动自然法则,遭受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

梁漱溟先生曾讲,人一辈子要解决三个关系:先要解决人跟物之间的关系,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的关系。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往往被理解为侧重于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却忽略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亦包含其中,甚至是处于最前端、最基础的位置。然而,天不能言地不能语,对于生态环境问题,人们容易后知后觉甚至视而不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几千年前,中国哲人已经总结出的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在今天,仍然需要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故事将之讲开来、讲下去,讲给每一个人,讲给明天和未来。

“你知道吗?鸟类是可以长距离飞行的,但蚯蚓并不能依靠自身力量漂洋过海。如果你在墨西哥找到的一种原生蚯蚓和大洋洲的某种原生蚯蚓近缘,大陆板块漂移会是唯一的解释。”这是著名的自然文学作家艾米·斯图尔特的作品《了不起的地下工作者——蚯蚓的故事》中的文字。在这本俏皮的小书中,艾米·斯图尔特带我们经历一场地下冒险,寻找我们星球最重要的守门人——卑微的蚯蚓。她揭露了我们脚下错综复杂的生物网络,观察着自家花园与蚯蚓箱内成千上万条蚯蚓,考察了蚯蚓在科学前沿作出的贡献——从有毒化学物质清理到关于再生的研究。

“一个人可以用一条吃过国王的蚯蚓作饵钓鱼,然后把吃过这条蚯蚓的鱼吃入腹中。”蚯蚓,这些细小的生灵对生态系统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们消灭植物病菌,翻动泥土,改造森林。它们甚至是两次大灭绝事件的幸存者,其中包括导致恐龙灭绝的那一次。

大自然总有我们看不见和无法理解的奥秘,所以艺术家们需要借助生态寓言来展示生态环境中五彩斑斓的故事。

3.

生态寓言类作品浩如烟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教堂尖塔》是一部具有生态意识的寓言作品。现实世界的索尔兹伯里教堂尖塔是建筑学的奇观,巍然屹立在并不坚实的沼泽地上;小说虚构世界中的尖塔则像“向上喷发的瀑布”,是教长乔斯林盲目的利己主义的象征,最终因为没有牢固的地基而倒塌。尖塔的建造是人类以上帝的名义掩盖自己的私欲,永无休止地征服自然的象征,尖塔的倒塌则象征着自然对人类的惩罚。自然是沉默的,但它并不会永远臣服。人类对自然过度的征服最终会招致自然的愤怒,愤怒的自然会给予人类严厉的惩罚。

追溯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原始和谐、分离对立到反思后的重新和解三个阶段,被誉为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生态寓言”的《古舟子咏》就是这一发展历程的写照。这部微缩的人与自然关系史既是历史的总结,也是人类违逆自然的一个教训。通过发掘诗中承载的历史,探寻《古舟子咏》中的生态意识,可以了解诗人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努力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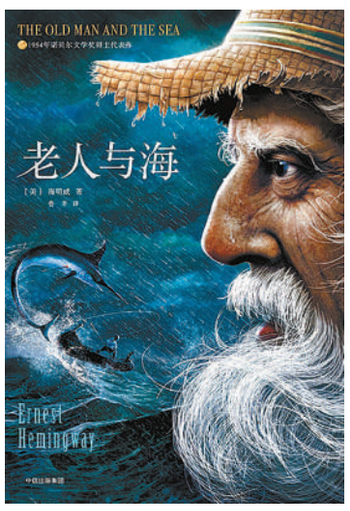
今天,生态寓言作品因为对环境的预测与忠告,也被称为启示录作品。1999年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推出了生态寓言小说《玛拉和丹恩历险记》。这部史诗般的小说描写了人类遭受毁灭性生态灾难的未来情景,映射了当今的现实问题,深受读者喜爱。随着生态危机加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态批评逐渐成为非常重要的批评方法。生态批评主要探讨了文学与环境的关系,以此唤醒读者的生态意识。

电影《阿凡达》用丰富的想象力与奇异的创造力向大家展现出一幅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旖旎图景:梦幻般的潘多拉星球上,原始的自然生态与纳威人相融相通,浑然一体。晶莹剔透的圣母、旋转飞舞的精灵、展翅翱翔的魅影……人与自然在这里沟通能量、交换信息、休戚共生。电影主人公萨利是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作为一名士兵,他代表着杀戮和荼毒,而他断掉的双腿隐喻着他那残缺不全的灵魂。当他进入潘多拉星球,以阿凡达的身份生存时,却有了直立行走的能力,这象征着他融入自然后灵魂的返璞归真以及自然对他的接纳包容,继而成为一个身体健全、灵魂干净的人。

人与自然的关系长久以来一直为人类所探讨:究竟是谁在征服谁,谁又凌驾于谁之上?历史上,人类在探索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已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阿米蒂是一座依靠海滨旅游业而得以兴旺的小镇,一条吃人大白鲨的出现在小镇上引起轩然大波。以市长沃恩为代表的政客和商人逼迫警察局局长布罗迪开放浴场,致使鲨鱼吃人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彼得·本奇利的《大白鲨》为我们展现出了人与自然强烈碰撞的景象,“极其成功地将惊险故事和道德寓言结合起来”,反映了“社会的、政治的和心理的冲突”。事实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非对抗性的,它们只是存在于同一矛盾中的两个方面。这两者只有和谐共存,才能达到双赢。人类只有正确认识并且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才能更好地利用自然造福自身。

《逍遥游》



《老人与海》

《教堂尖塔》

《古舟子咏》

史评

古代“盐枭”从何而来

程醉

“盐枭”是指古代有组织、武装化贩卖私盐的人,在很多热播的影视作品中都有他们的身影。盐枭的历史背景,大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的“官山海”政策。在回答齐桓公应该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时,管仲说:“唯官山海为可耳。”(《管子·海王》)随后他解释何谓“官山海”时又说:“海王之国,谨正盐策。”靠大海资源成王业的国家,要注意征税于盐的政策。简单地说,管仲时期的“官山海”主要是指盐、铁两项国家专营。

到了汉武帝时期,数十年东征西伐导致他最缺的就是庞大的军费。汉武帝听从大冶铁商孔仅和大盐商东郭咸阳的建议,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实行“笼盐铁”,也就是将盐、铁和酒的经营收归官府,实行专卖。

盐铁专营不但为西汉王朝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同时也抑制了地方诸侯、豪强、巨贾的势力。但是,盐铁专营同样也给农业生产、工商业以及群众生活带来了不便。公元前81年,大将军霍光以朝廷的名义召集“贤良文学”60多人,到京城与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讨论民生问题,史称“盐铁会议”。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会上,贤良文学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认为盐铁专营“与民争利”,违背了“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经过双方5个多月的大讨论、大辩论,会议最终决定废除全国的酒类专卖以及关内的铁官。多年以后,桓宽整理双方论辩之辞,撰述成著名的《盐铁论》一书。

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唐朝跟隋朝一样,实行食盐无税或低税制度。但是平乱打仗需要很多很多的钱,公元758年,唐肃宗李亨任命陕西人第五琦为盐铁使开始盐税改革。他的盐税政策大致就是官方垄断产业链上的收购、运输、销售这三个环节,同时将制盐的工人纳入盐铁使管辖,免除其徭役。可以说,盐税改革不但对平定安史之乱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唐朝中后期经济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了唐德宗时期,盐税政策改为“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呼风唤雨的盐商、盐枭从此粉墨登场。

唐朝薛渔思在其编撰的小说《河东记》中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叫龚播的盐商,“其初其穷,以贩鬻蔬果自业”,后来他在河里捡到一个“金人也,长四尺余”,“不十余年间,积财巨万,竟为三蜀大贾”。这里龚播捡到的“金人”,实际暗指他成为政府指定的盐商。仅仅10多年时间,龚播便从穷苦的菜贩子成了四川的首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只要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上天。

然而,垄断导致的盐价居高不下等问题,在唐朝末期也显现了出来。据《唐会要》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天宝是唐玄宗的号,至德是唐肃宗的号,也就是说,安史之乱初期盐每斗要10文钱。到第五琦盐税改革的那一年,《唐会要》记载一斗盐“为钱一百一十”。而到了唐德宗时,一斗盐“岁钱三百一十,其后复增六十”。

盐政与历代兴衰紧密相连。唐朝中后期兵荒马乱,政府职能趋弱,加上官盐质量欠佳且价格昂贵,而私盐则价格比较亲民,必然催生出私盐泛滥成灾。在一些地方,官商勾结贩卖私盐者有之,整村整坊集体走私者有之,团伙化、武装化贩盐者亦有之。

盐商家庭出身的黄巢考不起科举,在留下一句“我花开后百花杀”后离开长安。没多久,私盐贩子王仙芝便率众在今河南濮阳举旗造反。随后,黄巢也聚众数千人起义,响应王仙芝。虽然黄巢、王仙芝领导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大致也可以看作古代盐枭最为“高光”的时刻,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

宋神宗时,宋王朝推行“榷盐政策”,即低价收购、高价售出,致使煮盐的灶户破产逃亡,百姓买不起盐,而官家所囤食盐长期积压,损失严重。苏东坡因此而上《乞罢登州榷盐状》,要求撤销登州的榷盐政策。宋仁宗时,参知政事王随上奏说:“淮南盐初甚善……从而杂以沙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由此可见,宋朝的官盐制度仍然存在着种种弊端,出现私盐贩子并且演变成盐枭也就不足为怪了。

元朝末期,在官盐船上操舟运盐的张士诚发动“十八条扁担起义”,很快攻陷泰州、高邮。这些扁担正是盐帮成员挑盐的工具,可见当时盐帮的势力之大。明清两代,盐枭主要以盐商的形式出现,成为最能体现古代政商关系的行当。比如,清朝的大盐商江春,就被乾隆授正一品光禄大夫衔并追封三代、赐建四世一品坊。但官是不能白封的,洪水暴涨时,江春不得不捐银100万两给朝廷用于赈灾。

道光年间,盐枭黄玉林一案更促成了清朝盐政的重大变革。道光十年四月,湖南巡抚报称,黄玉林乃私盐巨擘,以仪征为据点,统领跨省贩私队伍,船只众多,私盐贩卖规模庞大,严重冲击官盐,造成税收损失,且其武装押运,官吏受贿勾结,地方官府不敢干预。道光帝随即命两江总督蒋攸銛严斥并务必捉拿黄玉林,彻底铲除此武装匪徒。蒋攸銛深知黄玉林与地方衙门关系盘根错节,官员亦多涉其中。他明白,一旦下令剿灭,两江或陷兵变,自己亦难逃厄运。因此,蒋攸銛提议招安黄玉林,望其归顺官府。道光帝却觉其难当重任。在道光帝尚未批复之际,蒋攸銛已与私盐贩子协商妥当。黄玉林率其手下8人,携船12艘、私盐37000斤,主动投案,接受招安。随后,两江盐政在黄玉林协助下,迅速破获另一起大案,缉获盐枭12名。自此,盐枭纷纷自首,总计400余人,没收白银万余两。岂料,黄玉林接受招安实为权宜之计,两个月后,黄玉林再次谋划贩私。黄玉林的反叛令道光帝震怒不已,他迅速将蒋攸銛撤职,并委派陶澍接任两江总督一职,彻查此案。陶澍果断行事,迅速将黄玉林绳之以法,从而终结了清代最大盐枭案。

盐枭虽然遍布历史的众多角落,但这个词却出自清代袁枚《子不语》中的一个故事。说的是盐场里的盐霸霸占了盐田,庙宇里供奉的关羽便到四川找来张飞合力将盐霸制服,并让周仓用铁锁链将其锁住,其实庙宇里锁住的是一块朽木,但村民指而言:“此盐枭也。”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1.00元 全年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61号)